



第五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六委员会
第35次会议
1996年11月7日
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第35次会议简要记录

主席:埃斯科瓦尔-萨洛姆先生(委内瑞拉)

目录

议程项目146: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94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单册。

Distr. GENERAL
A/C.6/51/SR.35
5 Decem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下午3时10分开始开会

议程项目146: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续)(A/51/10和Corr.1, A/51/177和Add.1-5, A/51/178, A/51/332和Corr.1, A/51/358和Add.1, A/51/365)

1. CROOK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提到国家责任问题,他说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中有许多内容对于法律作出了长远的贡献,但其案文也有严重的缺陷,如不加改正,美国政府不能接受。

2. 国家罪行概念的本身不能得到国家实践的支持,而且引起混淆。此外,从实际上说,关于对国家罪行赔偿的条款并没有意义。例如,它似乎允许所有国家因红色高棉未能保障人的生命而向柬埔寨要求赔偿,或因一国损害其本身的“人类环境”而向其要求赔偿。可是国家责任法在这两种情况都没有提供补救根本问题的有效工具。因此,委员会企图将有关所谓的国家的国际罪行的新规则编织成国家责任法,是既不恰当也不会有结果的。委员会必须从条款草案中去掉这些引起争议和无济于事的内容。

3. 条款草案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提出的解决争端的条款既不灵活也不实际。实际上,有无数的法律和实际的情况和争端可能涉及国家的责任。因此不可能或不适于制订任何固定的解决方式。此外,条款草案第54至60条所设想的解决方式对各方都十分烦琐,代价很高。由于这些理由,委员会在条款草案二读时必须对解决争端问题采取更为实际的立场。委员会最多只能提出各国可能使用的各种自愿的备择机制。

4.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对反措施的处理造成严重和不必要的困难。反措施虽然必须慎重使用,但它是鼓励国际法治的重要手段。实际上,一个国家可能需要立即采取步骤劝诱违反的国家照章行事和避免对自己的进一步损害。但条款草案对受害国如此保护自己的能力的施加了没有道理的限制。例如,第48条规定受害国在采取反措施之前必须履行第54条规定的谈判义务,但没有规定对这种谈判必须花多少时

间。因此,如一国违反条约义务,受害国如不进行几个月的事先谈判,根据同一或不同的条约显然不能对不法行为的国家扣留相应的利益;它必须接受继续对自己的损害。此外,第48条没有具体规定临时保护措施的性质,这对受害国维护其权利是必要的,也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同该条禁止的相应反措施有何不同。换言之,委员会的做法不符合国家的实践,也没有根据。委员会必须尊重相应的反措施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以确保国际法制。

5. 对违反国家责任的赔偿标准没有道理地背离既定的国际习惯法,根据该法受害国有权利为本身或为提出要求的国民取得恢复原状、补偿、满意和保障不再发生等形式的充分赔偿。然而,充分赔偿的标准受到这一规定的严重损害,即赔偿不得造成一国人民被剥夺其本身的维生手段。对充分赔偿规则的这种限定显然是非常主观的,很容易被滥用。它为可能的侵占者和犯有不法行为并企图逃避责任的人提供了轻易逃避之路。

6. 国际法明确规定,各国最近的实践和各国际法庭的裁决也确认,充分的赔偿(特别是对于侵占的案例)必须迅速、充分和有效。不能以犯有不法行为国家的生计或所称的缺乏生计对赔偿责任提出限制条件。

7. 最后,条款草案对利息作为赔偿的一部分的中心作用提出不必要的怀疑。第44条规定,赔偿包括受害国遭受的经济上可以评估的任何损害,可以酌情包括利息和利益的损失。实际上,曾审理该事项的现代法庭主张利息是赔偿的一部分。

8. 委员会必须改正这些缺陷,其工作才能被接受和有利地影响各国今后的行为。

9. MIKULKA先生(捷克共和国)提到委员会要求各国政府发表意见的问题,对于国际违法行为和国际罪行之间的区别,他认为除实质性问题外,对术语(违法行为和罪行)的选择也应慎重,即有两类不法行为,不论如何界定都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体制。他担心围绕两类不法行为基于选择术语的纯学术争论会妨碍审议整个条款草案的进展。

10. 该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必须铭记基于国际法的责任既不是民事责任,也不是刑事责任,而是纯国际责任,因此是特定的。在条款草案的二读中,委员会应考虑能否选择另外更中性的用语,或避免使用特定的用语叙述这两种不同的不法行为,采用其它办法加以区别,如将条款草案的案文分为两部分,分别处理此类不法行为和威胁整个国际社会基本利益的不法行为的后果。委员会应使用“国际不法行为”的用语,这是没有争议的。这能确保条款草案使用中性用语,同时给各国的实践和理论以足够的回旋余地,以便日后找出大家接受的术语。

11.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基本的需要是决定是否有两类不法行为,如果是,则确定损害整个国际社会基本利益的国际不法行为的后果。总之,需要制订因违反主要规则而启动的第二类规则。第19条对罪行的确定表明,首先是主要规则的性质决定那些违反构成罪行,从而加强了这种印象,即罪行的限定取决于主要规则的编纂,而这超出委员会的任务之外。但普遍认为对某一国际法规则的违反是否能列入某一特定的责任制度问题,不是取决于主要规则的性质,而是取决于违反的程度和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因此在二读时,委员会应认真地重新审查区分国际罪行和国际不法行为问题的这一方面。

12. 该国代表团认为,虽然应审查目前的术语,但应区分两类不法行为,因此应区分两类责任制度。

13. 该国代表团遗憾的是对第四章各条款的评论非常简单,没有详细说明条款草案第二部分第二和第三章的条款在国际罪行案件中的实施,因为第51条明确规定国际罪行引起任何其它国际不法行为的一切法律后果以及第52和53条规定的其它进一步的后果。

14. 最后,无法想象一种可行的刑事责任制度却未包括适当的执行机制,以便在国家采取反措施之前发挥作用。在目前情况下委托国际机构采取一切必要决定和措施执行罪行的法律后果是不现实的,但该国代表团建议委员会在条款草案的二读时应制订此方面的一般原则。

15. 关于反措施,该国代表团认为,鉴于执行国际法的中央机制还不完善,个别的限制或强制手段仍是国际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无视现实和声称反措施在国家责任法中没有地位将是言不及义的。

16. 有关反措施的条款草案表明委员会并不打算维持有关使用反措施的法律现状,而是致力于制订明确的规则以加强对防止滥用反措施的保障。例如,反措施不被视为受害国的一项权利,而只是排除某国一项行动的非法性的一种情况。

17. 此外,采取反措施不是犯下一项国际不法行为的直接和自动的后果。它需要由被认为不法行为的受害国的事先限定并需提出停止和赔偿的要求。此外,还需在犯有违反事项的国家对此项要求未能作出满意回应之后才能采取反措施。这些条件是意图减少轻易和从而滥用反措施的危险。

18. 可是,受害国在采取反措施之前要履行有关解决争端的义务(第48条第2段),似乎对条款草案有关解决争端体制的第三部分是否是强制性的问题作出了事先的判断。委员会因此应在二读时认真的重新审查第47和48条的内容。

19. 第49条涉及的反措施的适当性是决定其合法性的一个基本要素。此一原则非常重要,因为一项罪行可对各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应对每一个受害国单独适用。

20. 关于被禁止的反措施(第50条),该国代表团大力支持该条第(a)至(e)款列出的各项禁止,多数是根据绝对法。

21. 最后,关于解决争端的条款草案第三部分,该国代表团主张所设想的程序应是可选择的,因为条款草案包括了国家责任的整个问题,多数的争端是发生在国家之间。在这方面,他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未能找到避免下述风险的一种办法,即草案第三部分规定的程序可能与国家之间根据其它文书适用的程序相抵触,这些文书规定的解决争端办法在等级体系和执行条件上各不相同。

22. CONNELLY女士(爱尔兰)说,虽然现在没有普遍承认个人可以为某些行为承担国际法的刑事责任,但国家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概念则完全是两码事。作为一项理

论工作,当然可以设想将一个国家违反某项国际义务算作国际罪行,对这种罪行作出一般的限定并举出一些实例,委员会在条款草案第19条就是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国际法有一些核心价值,如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尊重每个人的固有价值、这些价值受到个人和国家的侵犯都应受到最严重的对待。但她怀疑将这种侵犯定为相对于个人的国家的罪行是否有任何实际作用。

23. 这有几条理由。第一,执行问题在国际一级比在国家一级问题大得多,因为执行义务的机构一般来说在国家比在国际完善得多。国家的刑法不仅规定审判涉嫌的违法者和惩罚被定罪者,而且在国家一级有进行审判的法庭以及拘留设施和调查涉嫌犯罪行为的机构。在国际一级尚没有类似的这些机构。虽然有各种国际组织便利国家间的谈判与合作,但它们远不能达到有效执行各项义务的要求,这些义务的违反可能引起国家的刑事责任。安全理事会确实有权采取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行动。但令人怀疑的是,如果不能在国际罪行方面也赋予一个国际机构这种类似的职权,对犯有国际罪行的国家将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使其承担责任。

24. 第二,对违反国际义务的赔偿是国内法民事责任的一个主要特点。但在一些体系中,刑事责任也可具有赔偿的义务,这样作是出于对罪行受害人的关切,并通过对冒犯共同价值的社会谴责作为对刑事制裁的附加物。将赔偿置于国际罪行法律后果问题的中心地位,人们可能认为委员会过多注意因不法行为后果所受到的伤害,而过少注意不法行为的社会方面。我们的问题是,国际罪行的概念是否不仅表示遭到违反的国际义务是特别重要的,而且这项义务也是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换言之,根据条款草案第40条第3款,所有国家都被视为一项国际罪行的受害国,因此所有国家都可要求不法行为国的赔偿,这并未完全解决不法行为的集体性质。

25. 因此,该国代表团不同意委员会在第51条评论中的意见,即认为将一种特别严重的不法行为称为“罪行”或“特别严重的违法行为”并不重要。罪行的概念具有其它形式的不法行为所没有的内涵。对这两种定义的选择应参照分类的目的。如如果分类是为了表示一些国际不法行为严重破坏国际秩序或道德,国家的集体利益要

求加以防止和制止,那么“国际罪行”的用语可能是适当的。如果分类是为了说明某些国际不法行为,从其性质或其后果来说比其它的此类行为更为严重,这种区分应反映于受害国赔偿权利的范围,那么“特别严重的违法行为”的用语似乎更为适当。

26.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委员会所提议,对不法行为的分类同各类如何称呼无关,这是否正确和可行。虽然一种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不论称为违法行为或罪行,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将该行为定为罪行则会产生其它的后果。实际上,即使同样形式的赔偿适用于各类不法行为,如恢复原状、赔偿、满意和保证不再发生,对一种国际罪行来说,则消除了对受害国的恢复原状或满意的权利的某些限制。此外,某国犯下一种国际罪行会引起其它所有国家的若干义务,包括不承认罪行造成的情况属于合法,同其它国家合作实施第53条草案规定的旨在消除罪行后果的措施。

27. 爱尔兰代表团深信,排除对受害国要求恢复原状的权利的限制问题必须作为不法行为分类的一项后果来对待,不能作为在特定案例中要求恢复原状的公平问题对待。关于限制受害国得到满意的权利,危害不法行为国的尊严的概念,似乎是一个非常模糊和主观的概念,不管对不法行为如何分类,其价值都是令人怀疑的。关于第53条草案所列的义务,需要指出它们是来自对任何国际不法行为的违反,而不只是国际罪行或特别严重的违法行为。国家的国际罪行的责任显然是这种情况之一,即将国内法的概念应用于国际领域需要认真的考虑。

下午4时散会。